

城市拾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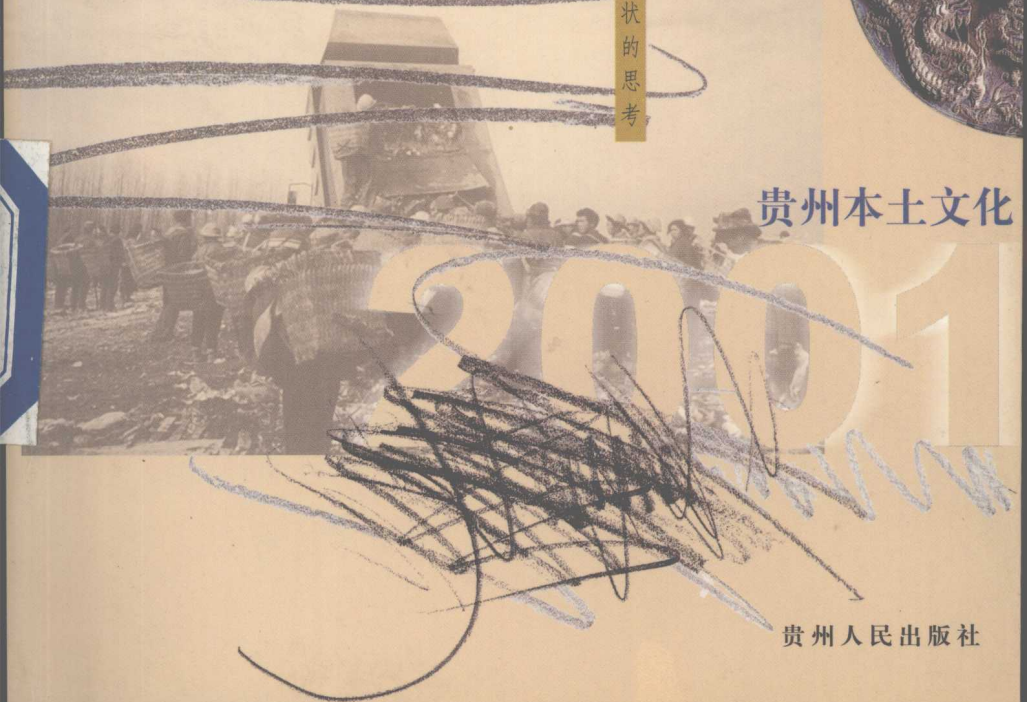
张寒梅/著

对一个边缘群落生存现状的思考

g u i z h o u b e n t u w e n h u a

贵州本土文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城市拾荒人

——对一个边缘群落生存现状的思考

张寒梅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城市拾荒人: 对一个边缘群落生存现状的思考 / 张寒梅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7
(贵州本土文化. 2001)
ISBN 7-221-05514-9

I. 城... II. 张... III. 废物回收-就业人员-社会调查-贵阳市 IV. D6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1729 号

城市拾荒人

著 作 人: 张寒梅

责任编辑: 王才禹 张 罗

封面设计: 曹琼德

版式设计: 施德端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5.125

印 数: 1 - 1000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221 - 05514 - 9/C·77

定 价: 6.80 元

内 容 提 要

贵阳市的边缘，生活着一群群以苗族、布依族等为主的拾荒者。他们走出贫困的大山，为了生存，每人都有一串催人泪下的故事，也偶有一支欢乐的歌。他们怎样从昨天走来，如何走过今天，将怎样走向明天？他们对现代化城市的建设有什么贡献，又给社会带来了哪些问题？作者在书中让我们认识了这个群落。

序

钟敬文

1987年我曾借赴贵州参加全国中青年民俗学术讨论会之机，去黄果树布依族聚居的地区看了看，2000年又参加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的终审工作，深感贵州这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民间文化（包括民俗）很丰富，很有特点。贵州民协的同志们多年来在民间文化搜集、整理、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编印了《贵州民间文学资料》79集，在全国很有影响；后来出版了《贵州民俗论文集》、《贵州古文化研究》等书；1997年又出版了《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11册和《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10册，我曾为该丛书作了序。我对贵州的民间文艺、民俗文化一直关注，也有感情。这次出版“贵州本土文化丛书”，贵州同志要我写序，我也很高兴。

民俗学者清理和研究民间民俗文化，可以用民俗科学的知识去教育国民，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曾经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历来中国人怎样看待这类问题，哪些是一般中国人认为可以变化的，哪些是不大变化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感情、价值观、思想观念、理想、信仰以及个体、集体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历史联系等等。

民俗文化也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试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他们的居住、饮食、服饰、语言都变了，但每年还要过春节。在过节的喜庆时刻，还要耍狮子、耍龙灯、放鞭炮、吃年糕，和国内的同胞保持一样的风俗习惯。为什么？如果国民具备了一定的民俗文化知识，就会认识到，舞狮子、耍龙灯，不只是艺术活动的形象，在舞狮子的行为里，还表达着十分具体的乡土感情，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凝聚力这东西，一眼看去，没有钞票那么重要。当然，没有饭吃是不行的，但没有精神支柱，就是有了饭吃，也不过是动物而已。没有高尚的民族感情，就是物质享受再优厚，人也是寂寞的游子。这一点，我感到很重要。

在中国，上、中、下三层文化都很发达。但中华文化更大的文化金矿，在中、下层文化，即民俗文化之中。在数量上不但铺天盖地，异常丰饶，而且在质量上也到处呈现着耀眼的黄金碧玉。这些文化财富，是应该令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后代引以为自豪的。

贵州属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滞后，但民间文化蕴藏却极为丰富，这是贵州极大的优势，贵州的同志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新世纪的元年，再次推出一套《贵州本土文化·2001》丛书，把民间文化研究接连做成套书推出，能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个做法很好，这种精神值得赞扬。这套10余册的丛书，展现贵州各民族特殊的文化群落、特殊的民族婚恋、特殊的民间信仰和祭奠、特殊的民俗事项等。相信这套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促进贵州文化资源开发，让国人和世界了解贵州都会起到好的作用。

2001年6月19日

引言

在我的记忆里，“拾荒”两个字，原先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偶尔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在街市的垃圾堆捡破烂，也从不在意，从未去追问过他为什么来干这个行当，更不曾想到这个行当居然能够维持生活，养家糊口。曾几何时，在我工作的这座城市——贵阳，随处可见操着乡音族语，衣着与城市人有明显区别的拾荒者穿梭于繁华的街巷楼宇之间，或提着编织袋，或背着箩筐，手持特制的铁钩，搜寻着垃圾堆中的可拾之物。渐渐地，我被他们的装束和语音所吸引和震动，这个流浪的群落之中，竟有一部分操着与我一样的母语，是我的苗族同胞。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要来拾荒？他们的故乡在哪里？何处是他们的归宿？

我深深地为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是农民，他们的正业是在田土间种植粮食。但是，这些拾荒者为什么远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来捡拾城市人丢弃的垃圾？我难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生存困境，才来忍受这样的一种屈辱和艰辛。我带着关注他们的感情，走近他们，了解他们。

贵阳市的拾荒者主要来自纳雍、织金、关岭、镇宁、六枝、都匀、惠水等地贫困山区，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他们有的在垃圾场附近安营扎寨，就近拾荒；有的则走街串巷拾荒。一些是举家进城，夫妻双双拾荒；一些是妻子拾荒，丈夫从事拉煤耙、背背兜或打扫卫生等；还有一些是家在农村，家庭中有一个成员或数个成员到贵阳拾荒。她们或者是长年在在外，或者是

农闲时出来。她们的拾荒地主要在大转弯垃圾场、东山垃圾场以及贵阳市区所有大大小小的街道。她们的居住地主要在头桥、威清门、油榨街、望城坡、龙洞堡、麦秆冲、皂角井、陈庄坝、新村、沙冲路、石灰窑、太慈桥、电视塔、月亮岩、朝阳洞、中曹司等地。

拾荒这个行业，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和景况。我国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从建国以来就由国家的点、站、公司三级收购系统统一收购。国家不仅有遍及全国的废旧物资回收网络，也有一大堆从事回收分拣工作的在编人员。一方面是国家有完善的回收系统；另一方面是物质水平低下，人民生活俭朴，几乎没有多少东西可让人到垃圾里面去捡。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垃圾急剧增加，而国家的废品回收行业却在萎缩。于是，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或进入各种行业的同时，拾荒业也以一种新的规模和面貌应运而生。然而，和其他打工行业相比较，拾荒行业至今不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和尊重。尽管也有人看到拾荒行业对一座城市的环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变废为宝功不可没。但更多的仍是鄙夷和歧视，甚至还毫无道理地把他们和小偷小摸等相提并论。这对于一个同样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劳动群体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在我所访问的拾荒者中，她们都诉说拾荒比在家种地辛苦：天不亮就起床，草草吃过早饭，便去奔波忙碌一天，走很多很多的路，直到天黑才回来，有时候夜半三更还游走在冷清下来的街巷之中。垃圾是肮脏的，那么整天整夜拾垃圾的拾荒人，便难免沾染了垃圾的色彩。因为这不受欢迎的外表，因为这低下的行当，使得这些辛勤劳作的乡下人们即使拥有最高尚的心灵，也

依然难免遭到城市人的冷眼与非议。这便是拾荒者目前比其他劳动者更为艰辛的生存状态。

我真正对拾荒者也不理解，只是凭着想象以一种怜悯和同情去看待和接触他们。然而当我走近他们时，呈现给我的却是一个独特而多彩的世界。出于对这个边缘群落的尊重与为其鸣不平，我写下了这本书，目的是通过对城市拾荒人生活的零星实录，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对她们的关注与理解。

真正促使我走近拾荒者并写这本书的动力，是在一次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讨会上。有一位来自惠水的代表在会上发言，说惠水离贵阳很近，并不是贫困县，然而惠水的苗族却拾荒者多。这使我很惊讶。据资料介绍，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惠水县，距省城贵阳市仅54公里。境内田土肥沃，物产丰富，是全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黑糯米，就是惠水县内摆金、雅水等地的特产。那么，惠水这么一个鱼米之乡怎么会这样呢？我们难以相信每天在繁华的都市上看到背着装废旧物品的编织袋匆匆而过的拾荒者，大多都来自惠水。这一话题，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也留下太多的疑问。后来，贵州省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策划出版一套“本土文化丛书”，省社科院也正巧有一个拾荒课题要做，我就提出了本书的题目，并申请参加了社科院的拾荒课题，同时也选择了惠水拾荒者作为我考察研究的对象。最后的成果就成了这本书的主体内容。

在所有的拾荒者中，惠水拾荒群较为独特。因为惠水离贵阳很近，因而决定了惠水的拾荒者都以家乡为立足点。只把贵阳当成一个挣钱基地。出门拾荒只是去“做生意”。她们普遍都不把家安在贵阳，也不打算成为贵阳人。她们只想在贵阳挣

钱。惠水的拾荒者不是驻留在垃圾场拾荒,而是走街窜巷,深入到贵阳市区每一个角落去收寻。这种方式比驻留在垃圾场未知因素更多,风险更大,颇有点闯荡江湖的意味。这就决定了惠水拾荒群吃住更差、更苦、更不稳定。她们通常是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屋子,或者一群群人集体露宿街头桥脚。惠水拾荒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约90%都是女性。她们绝大部分是只身外出,她们的丈夫则留在家里料理农活及家务。而这些没有文化、汉语都说不好的妇女最初是如何进入拾荒这个行业,又是如何离开乡土到城市闯荡的,的确值得关注和探究。

苗族的支系较多,惠水拾荒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一个历史上被别人称为“打铁苗”的苗族支系。

迄今已有一千多万人口的苗族,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由于历史上深重的灾难和频繁的迁徙,形成了许多支系和目前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在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两湖、海南、北京等九个省区,还有境外的东南亚、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都有苗族人口居住,居住在贵州的苗族,就大约占了苗族总人口的一半,几乎是县县有苗族。单是惠水一个县,就有八个苗族支系。“打铁苗”就是其中之一。“打铁苗”系他称(因其擅长打铁而得名)。这种称谓方式,就民族学的角度而言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但为了便于叙述起见,本书也只好如此借用(后面提到的歪梳苗、青苗也同样道理)。这支苗族自称“mao⁵³”主要分布在摆金、甲烈、甲浪、大华、和平、鸭绒等乡镇部分村寨,他们至今仍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服饰。语言为苗族川黔滇方言惠水次方言。据了解,多数“打铁苗”村寨都有人外出拾荒。作为本书拾荒村寨调查点的卜所村、兴摆

村、大华村，曾经拾荒或正在拾荒的家庭多达 80% 左右。

为什么惠水“打铁苗”支系拥有如此庞大的拾荒人群而其他支系没有？这可能与他们历史上处于驿道枢纽，接触外界机会多，以及他们具有“闯出去”的传统有一定关系。据历史学、民族学家杨庭硕先生介绍，历史上“打铁苗”居住的摆金坝子是很大的聚居区，也是很富有的地区。早在改土归流前这一带“打铁苗”就已将木材、稻米输出，换回可观的收入。他们最先从木佬人中学会打造农具。清末年间，他们就已有不少人读书，有的还考取过举人和秀才。民国后期，土烟和木材生意还造就了好几位在省城闻名的商人。这些历史及其启示，更形成了“打铁苗”支系敢于“闯出去”找钱的心理依托。然而，现实却又是这样尴尬，如今“闯出来”的“打铁苗”人，并未出现有如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是造就了一批社会地位低下的拾荒者，对此我没有把握说清楚是为什么。但有一点很清楚：这是贫困使然。虽然惠水境内的农业物产如前所述得天独厚，但是“打铁苗”聚居的地区则由于人多地少，原先靠土特产和商业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一旦丢失就再也养不活这样密集的人口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开始复苏，“打铁苗”又才有机会走上了拾荒之路。十余年来的城市建设和发展，给拾荒行业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城镇垃圾越来越多，工业垃圾的分拣处理等工作量越来越大，需要的拾荒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拾荒也不仅是为了再利用，还兼有了维护环境的新使命。拾荒产业不仅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部门，而且是环境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拾荒业正逐步形成城市需要规范的一个必需产业，而这些拾荒者正在这个产业的形成和规范的过程中扮演着某个方面的主角。因此大家不要把拾荒

者定位为可怜的群体而去阅读本书,而是应当把他们当成和自己一样的现代人去理解。这即是我写作的初衷。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力求客观真实,原汁原味,所以很多地方大量地采录了拾荒者的口述材料。但为了对被采访者表示尊重,本书中一些人名地名采用化名处理。

本书资料调查的时间跨度为1998年11月至2001年3月,其间我去了拾荒者出发地4次,在贵阳的拾荒地调查了若干次,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访谈、参与、观察。通常我们所说的“拾荒”应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拾荒”应指包括“收荒”、“收购”等在内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的全过程。而狭义的“拾荒”主要指从废弃物中“捡拾”、“分拣出售”的行为。本书大部分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狭义的“拾荒”行为。关于“拾荒”的种种称谓,也在这里说明一下:“拾荒”是对废品回收利用行为的一种文学性的称呼。环卫部门称为“拾废”,垃圾场的拾荒者所称的“掏渣渣”和“捞渣渣”在本书中都没有使用。但本书中大量出现“捡纸”和“捡渣渣”是惠水拾荒者自己的说法,一旦我引用她们的口述时,就沿用她们自己的这些说法。

目 录

引言.....	(2)
一、涌向都市的拾荒群	(1)
二、拾荒风潮的冲击与反响.....	(20)
三、拾荒人在都市里的“家”.....	(39)
四、拾荒女的一天.....	(57)
五、避不开的意外.....	(73)
六、拾荒者的精神世界.....	(86)
七、拾荒的女人和男人们	(100)
八、割不断的乡土情结	(116)
九、拾荒这个行业	(129)
结束语：与有关专家学者讨论拾荒现象	(142)

第一章 涌向都市的拾荒群

· 为什么进城拾荒？

自从我听到惠水代表的发言以后，我就再也忘不了这件事。后来我终于下了决心去惠水看一看。1998年11月28日，我和省社科院的两位老师一起前往惠水。



依山傍水而人多地少的卜所苗村

那天早上，我们在当地的几位苗族干部的带领下到了一个据说拾荒人数很多的典型村寨——卜所。我们先把车开到乡政府，再步行进入村寨。到了那里，景观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是苗族，出生于农村，因为工作关系到过很多贫困地区，所以在以往的印象中，贫困的地方要么是石头裸露（喀斯特地貌），要么高山峡谷，一路崎岖险峻，民居破烂不堪。然而这个地方十分平坦，交通方便，视野开阔，山坡平缓，而且都是土山，寨容寨貌及民居看上去并不差。该村寨离乡政府不到一华里，可以通车直到寨边。错落有致的民居紧靠着一匹缓坡，寨前便是一坝平坦的田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所历史悠久的民族学校，该校曾培养过不少人才。这个卜所寨还出了一名全国著名歌手。总而言之，从外观上看，这里没有一点特别贫困的迹象，它根本无法与成群外出“拾荒”的现象联系起来。

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去的那一天，正遇到寨上有一家人立房，全寨的人都来帮忙，包括外出拾荒的人也赶回来了。因为我们一行三个人都是苗族，又有当地的苗族干部介绍，因而很快得以访问两位拾荒女，证实了以前那位惠水代表的发言。

我们访问的这两位妇女，一位 25 岁，一位 45 岁，两人都在拾荒。

25 岁的那位妇女有 5 姊妹，除了一个弟弟在家读书外，其余的四个女孩子才七、八岁就开始跟着妈妈出去拾荒至今。如今她妈妈 50 来岁了，她自己也已成家，但是她们仍在拾荒。

45 岁的那位妇女也是十几年前就开始拾荒至今，拾荒是为了供孩子在聋哑学校读书。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惠水苗族纷纷到城市去拾荒呢？

2000 年 2 月份，我带着一系列的问题第二次走进这个村

庄。我仍然先去了乡政府，一位副乡长把我带到一位干部家。那位干部又将我带到村民家访问。搞这个课题最大的难度就是接触人。拾荒者们往往因为自己既不完全被家乡人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被城市人排斥，因而戒备心理很重。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外人，就是当地的拾荒者与非拾荒者之间，也有一定的隔膜。我们去访问了其中一家，女的正与我们交谈，她的丈夫进来就不高兴，似乎还用苗语责备了陪同我去的那位干部。我虽然是苗族，但因为方言不同，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大概是不欢迎的意思。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慢慢地了解到了一些情况。通过调查，我发现当地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并不像它的外观给人的印象。例如有一户人家，两个老人，都60多岁了，房子窄小破旧，因为交不起电费，连电灯都没有，就是煤油灯也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用。我们打电筒进去，看见人畜同居，牲畜住在一边，人住在另一边。家中只有两个老人，孩子们全都拾荒去了。

在我后来的了解中得知，当地虽然看上去好像挺富裕，但人多地少，田又是“望天田”、“响雷田”，水源没有保证，而且没有其他经济收入。有时候买盐巴吃还要靠卖米换钱，因而又造成粮食不够吃。可以说贫困是拾荒的直接原因。正常的年成尚且如此，一旦遇上自然灾害等，他们就更没有办法了。这样外出拾荒，便成了比种地更为可靠的谋生方式。

在我后来的调查中，事实确实像我上面所说的。在我到卜所寨去多次了以后，我向村长了解卜所的基本情况，并请他就村里农户的经济水平的好、中、差给我提供一份30户的名单。结果他给我提供的这份名单很能说明问题。卜所寨共有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口，全部是苗族（打铁苗支系）。在村长提

供的 30 户人家中，生活较好的有 8 户，中等的有 14 户，较差的有 8 户，将他们与拾荒相关性统计的结果是：

好的 8 户人家中有 1 户拾荒，1 户收购；

中等的 14 户人家中有 13 户拾荒，有 1 户未拾；

差的 8 户人家有 7 户拾荒，有 1 户未拾。

可见，拾荒与贫困关系很大。

我们再从全村的 2000 年经济收入统计数来看（估算）。

全村的粮食总产量为 60 万斤，人均约 272 公斤。全村约 20% 的户数略有余粮，约 50% 的户数够吃，还剩约 30% 的户数缺粮。全村的年货币收入为：

卖粮食：2 万元；

鸡鸭：0.8 万；

拾荒：.13 万元；

打工：2 万元

背背兜：1 万元；

卖猪：2 万元；

卖柿子：3.5 万元；

总计：24.3 万元。

全村人口共 1104 人，

每人年均货币收入：220.11 元，

每月每人：18.34 元。

从以上可以看出，卜所除了少量的种养殖业收入外，其余